《盐铁论》“治天下”论辩及其史鉴价值

魏凯文

（中国政法大学 国际儒学院，北京 100088）

摘　要：《盐铁论》中记载了御史大夫桑弘羊和贤良、文学等人士“治天下”的异见。双方对匈奴身份的认知不同，得出的应对策略也不同。御史大夫一方认为匈奴强盗之国，屡犯边境，应当出兵讨伐；而贤良、文学一方认为匈奴小国，不足挂齿，当用仁德引导其归顺汉朝。在具体理由上，双方就“要不要治理”和“治理的理论、实践正当性”展开论辩，分别是“华夷之辨”“仁义之辩”和“利弊之辩”。论辩过程中渗透的儒家思想或明或暗地主导着论辩的走向，致使这场论辩并非全然意见相左。这场渊源于儒家思想的“治天下”理论反映了双方的政治意图和身份意识，为治理国家间关系提供了较稳固的文明观。但对于依法治国的当代，“治天下”的文明观提供文明自信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法治发展。

关键词：《盐铁论》；国家治理；天下；匈奴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4-0110-09

收稿日期：2025-05-21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2023NDYB45）：新时代诉源治理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魏凯文（1996-），女，河南郑州人，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博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4.009

《盐铁论》记载了西汉昭帝时期的一次治国策略的论辩，该会议内容丰富，意在对当时民间疾苦的缘由进行剖析。会议的主要发言者分别是御史大夫和贤良、文学。时任御史大夫的是武帝时期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桑弘羊，他为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提供了包括实施盐铁官营、增加商业税收、扩大经济贸易在内的诸多有效政策，是朝廷谋取财利的重要助力者。参与“盐铁会议”的贤良指品德高尚的有识之士，主要从三辅、太常选拔而来，文学则是专门研究儒家经典之人。贤良、文学都是汉代察举制度所选拔的人才，都属于儒生的范围。双方的身份和政治立场不同，在论辩中的认知视角和治理策略也相异。双方的论辩与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在《盐铁论》第十（复刺）篇中，文学的一番发言，能够体现盐铁会议的具体内容：

> 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勋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进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礉溪熊罴之士隐。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①

这段对盐铁会议召开时的社会背景做了真实贴切的概括。西汉朝廷先是为抵御外敌重用有计谋的将士，重赏战场立功的“奋进之士”；随着战事吃紧，军费不足，朝廷则推崇谋利以资军用，一大批为朝廷谋利的“兴利之臣”在当时活动频繁；由于朝廷向民间大肆取财，导致一些官吏从中牟利，通过贩卖官位、徇私舞弊等行为欺上瞒下，大兴残酷法令，这些“憯急之臣”令百姓苦不堪言。由此可见，“奋进之士”“兴利之臣”和“憯急之臣”的“兴”“起”“进”反映了当时汉朝统治下国家的主要活动，更对应了汉朝统治者实施国家治理的方式及其重点对象。“奋进之士”对应了国家间关系治理，盐铁会议语境中主要指收复匈奴、实现天下一统；“兴利之臣”对应了财利治理，包含了财产物资的分配；“憯急之臣”则对应了人的治理，涉及刑罚或道德治理手段的选择问题。

①（汉）桓宽撰，陈桐生译注：《盐铁论》卷二《刺复第十》，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108 页。

总地来说，盐铁会议中的治理包括国内治理和涉外治理两方面。在国内主要是治利和治人，涉外治理则涉及中国古代大一统目标的体现，本文将其概括为“治天下”。会议中关于“治天下”的论辩主要是对匈奴问题的探讨，学术界中已有较多历史、外交、民族等思想层面的论述，[①] 能清晰地呈现贤良文学和御史大夫在匈奴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分歧。但本文无意考量汉代边境关系与外交史实，而侧重该论辩呈现的儒学思想共性及其对当代治理的史鉴价值。

一、匈奴身份的认知歧见

盐铁会议中，御史大夫和贤良、文学对匈奴问题的探讨都是基于各方对匈奴身份认知展开的。在双方的发言中，尽管已存在“中国是大国、匈奴是小国”的共识，但对匈奴的实力表现都有一定程度的顾忌，针对匈奴的实力认定也分别得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因此，对匈奴身份的认知产生的岐见构成了辩论的逻辑起点。

（一）侵盗不止，背叛不臣

御史大夫一方对匈奴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在实际行动上，匈奴恣意侵入我国边塞，屡犯边境，烧杀劫掠，严重威胁边境安全；[②] 在主观态度上，既无和睦修好之意，也无诚恳称臣之心，多次磋商都不能与其维持各自为政、互不干涉的关系。[③]由此御史大夫认为匈奴是汉室治理天下最棘手的对象。对于御史大夫的表述，实非武断，自古中国与匈奴的交战就非常频繁，秦时蒙恬尚能牵制住匈奴使其向北迁徙，但在蒙恬去世后趁国内动乱，“于是匈奴得宽，”[④] 又伺机南下，屯兵边塞，侵占中国国土。到了善战的冒顿单于掌权，又多次向汉进攻，“白登之围”更是设计将率兵进攻的汉高祖困于其间，高祖脱险后不得不通过和亲方式缓解关系。但在达成和亲协议后，匈奴还是违背了和约，串通叛臣韩信侵盗代、雁门、云中郡县。[⑤]最终汉朝虽将领土收复，但匈奴精明善战、多次侵犯领土和反复无常、不守契约的形象已经非常显著。正如汉文帝在公元前 174 年给单于的修书所言：“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⑥] 高祖之后，惠帝、文帝、景帝三朝，对匈奴的非武力政策都得到了延续，足见当时的匈奴侵盗不止、善变无常，实为汉朝威胁。

但需注意的是，御史大夫的言辞并不仅仅谴责匈奴多次侵犯、不守合约的“无礼”行径，而重在“不臣”，居高临下之意由此可见。御史大夫的此种想法并非无理由的狂妄，其观念既反映了史实真相，又呈现出与贤良、文学截然不同的观点。桑弘羊亲历了汉武帝的一系列对匈政策，熟悉武帝对待匈奴并非满足于与维持“约为昆弟”[⑦] 的平等关系，而是想要其“亟来臣服”[⑧]。这其实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武帝好战，而是与匈奴频繁入侵的史实有着直接关联。自元光六年（公元前 129）至太始三年（公元前 94）的约 35 年间，《汉书·武帝纪》中就记载了 17 次匈奴入侵的史实，这种高频率的挑衅和侵犯就使人不得不对大汉王朝意欲使其臣服的意图保有同情的肯定了。另一方面，桑弘羊等人的论述中多含对外邦的轻视鄙夷和警戒防备之意，大夫直接引用“《春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为其无信也。”[⑨]此言正是来自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⑩] 很显然，此处御史大夫既要表明对匈奴夷狄之国的不屑，又通过类比表示对匈奴这种无信之国应当时常警惕，更借古籍观点表达了当时政府高层实现天下大一统的宏图大志。不得不说，御史大夫对匈奴的认知既体现敏锐的

---

①任宝磊：《从“轮台诏”到“盐铁会议”：以〈盐铁论〉观西汉中后期对匈奴政策的重大转变》，《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3 期；陈拯：《〈盐铁论〉对外关系辩论与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研究》，《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4 年第 4 期；王虹，龚萍：《〈盐铁论〉与汉代民族关系史研究》，《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3 期。

②（汉）桓宽撰，陈桐生译注：《盐铁论》卷一《本议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7 页。

③⑨（汉）桓宽撰，陈桐生译注：《盐铁论》卷八《世务第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450 页，第 450 页。

④⑤⑥⑦（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748-3749 页，第 3754 页，第 3758 页，第 3756 页。

⑧（汉）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89 页。

⑩刘尚慈译注：《春秋公羊传译注》，成公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417 页。

现实反馈，又饱含深切的理想追求。

（二）事省致用，易成难弊

贤良、文学对匈奴的评价是比较复杂的。在客观上，贤良、文学既认同匈奴蛮夷之国，不通礼义，又肯定了匈奴具备战略自保甚至攻击能力。这与御史大夫一方认定的匈奴是小国、易于战胜是不同的。《盐铁论》中论功篇记载了双方对匈奴能力的认定，可见二者观念之异：

大夫曰："匈奴无城廓之守，沟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仓廪府库之积，上无义法，下无文理，君臣嫚易，上下无礼，织柳为室，旃幕为盖。素弧骨镞，马不粟食。内则备不足畏，外则礼不足称。夫中国天下腹心，贤士之所总，礼义之所集，财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谋愚，以义伐不义，若因秋霜而振落叶。《春秋》曰：'桓公之与戎、狄、驱之尔。'况以天下之力乎？"①

大夫言语之间对匈奴多有不屑，分别从城池防守、兵器设备、粮食储备、礼义修养、生活设施、战略智慧各方面表达了匈奴的不足之处。而汉朝居于世界中心，贤士汇聚、礼义完善、财用丰富、智谋双全，强弱高下显而易见。但文学却不以为然，给出了更为独到的见解：

文学曰："匈奴车器无银黄丝漆之饰，素成而务坚，丝无文采裙襦曲襟之制，都成而务完。男无刻镂奇巧之事，宫室城郭之功。女无绮绣淫巧之贡，纤绮罗纨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难弊。虽无修戟强弩，戎马良弓；家有其备，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贯弓上马而已。资粮不见案首，而支数十日之食，因山谷为城郭，因水草为仓廪。②

文学更关注事物的实用性而非装饰性，事务简省并不代表劣质，反而是耐用的，物品容易做成并不代表简略，反而难以坏掉。匈奴的器用正是此种情形。匈奴的车辆器具和丝绸衣物虽无奢华精美装饰，但都务求完整、坚固、耐用。男女臣民都不擅精工巧做之事，而做务实之事。至于战马良弓虽不多，但全民皆兵；粮食储备随不多，但极易就地取材。不够奢华昂贵不代表羸弱易攻，所以匈奴并不像大夫所说那样不堪一击，也不一定在汉朝之下。

在客观上文学的评价可以说是对匈奴能力的肯定甚至褒扬。那么主观上呢？贤良、文学眼中的匈奴是否同大夫一样认为其是狡黠之辈呢？此处反映出双方观点的异同。贤良认为，匈奴生于沙漠这般不毛之地，早已被"天所贱而弃之"③，并且指责推崇征战匈奴的大臣是"好事之臣"④。意思是，匈奴根本不配被我朝改造，让他们自生自灭即可，苛责他们不守礼义实属多此一举。此中傲慢不屑可见一斑，丝毫不逊于御史大夫"夷狄"之论，从双方鄙夷匈奴这个层面来看，二者又是观念相同的。贤良文学的否定评价同于御史大夫，但理由与程度又异于大夫，其间缘由值得深思。

二、政策实施的权衡与论辩

御史大夫和贤良、文学对匈奴的认知不同，对待匈奴的政策也不同。御史大夫认为，匈奴虎狼之国，应当重兵以伐之；而贤良、文学认为，匈奴情况复杂，应当以仁德导之。这截然不同的政策除了对匈奴身份特征的认知差异，也源自双方对汉朝国情的把握和彼此迥异的文化理念、经验背景。综合来看，二者的权衡因素主要围绕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本文将其概括为"华夷之辨""仁义之辩"和"利弊之辩"。

（一）华夷之辨

从前文双方对匈奴的认知来看，论辩过程中的双方在潜意识里都已经将匈奴问题纳入汉朝治理体系，使之成为"治天下"的对象。这不仅是回应会议主题"问民所疾苦"⑤的自然结果，更是汉代政治家们不言自明的默契。所以"华夷之辨"处理的是"要不要治理匈奴"问题。

作为中国历史上自强秦以后的一大统一王朝，秉持强大国力的汉朝不仅为周边各国所仰视，更使国民

①②（汉）桓宽撰，陈桐生译注：《盐铁论》卷九《论功第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87页，第488页。

③④（汉）桓宽撰，陈桐生译注：《盐铁论》卷七《备胡第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82页，第382页。

⑤（汉）桓宽撰，陈桐生译注：《盐铁论》卷一《本议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页。

生发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正如御史大夫所言，四方邻国已有三方臣服，“往者，四夷俱强，并为寇虐……今三垂已平，唯北边未定。”① 这足以证明当时的汉朝具备使诸国尊崇的实力，在这一点上，御史大夫一方和贤良、文学一方又达成了共识，并且基于此观念不约而同地赞同收复匈奴，实现大一统，而这一理念上的共识也具有儒学上的“家族相似性”。

尽管御史大夫和文学对如何收复匈奴的具体政策有分歧，但在藐视匈奴上，二者观点一致，都认为匈奴是夷狄之国，不可与大汉王朝相提并论：

大夫曰：“《春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为其无信也。”②

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然犹修城郭，设关梁，厉武士，备卫于宫室，所以远折难而备万方者也。今匈奴未臣，虽无事，欲释备，如之何？”③

文学曰：“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统，陛下优游岩廊，览群臣极言至论，内咏雅、颂，外鸣和銮，纯德粲然，并于唐、虞，功烈流于子孙。夫蛮、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烦虑，而有战国之忧哉？若陛下不弃，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内向，款塞自至，然后以为胡制于外臣，即匈奴没齿不食其所用矣。”④

大夫引用《春秋》中的观点以表达夷狄与华夏相区分，⑤ 而汉朝天子是天下共主，按照《礼记·王制》记载：“东方曰夷、西方曰戎、南方曰蛮、北方曰狄”⑥。匈奴狄国当归顺汉朝，而其至今未臣服，是汉朝的祸患。文学则认为，如今已经天下一统，九州同在汉朝这一个中国的统治之下，陛下自当悠闲自得，对于匈奴区区蛮、貊之国无需挂齿，如陛下不嫌弃他们，施以恩德，他们自会归顺。

双方都提及的夷狄与华夏之分根自儒家经典，除了上述《春秋》，华夷之辨的观点在儒家经典中比比皆是。孔子在告诫弟子坚守为人处世的仁德底线时，就曾说即便到了落后的夷狄之地也要始终如一⑦；孟子强调要用华夏（中原）的文化和礼制去影响或改变蛮夷之国的文化和礼制，而非相反受影响于蛮夷，表达了华夏文明优于蛮夷文明之意：“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⑧ 类似观点不胜枚举。分辨华夷之间的区别表达了华夏民族对文明的自我认同，这种自我认同为实现“大一统”的“治天下”理想提供了观念基础和理论起源，这也符合汉代作为大一统国家进行政治统治的目标和时代任务。我国历史上的首个“大一统”始自秦朝，秦始皇实施各项统一举措加速了统一步伐，使得产生自先秦时期的“中原为华夏，四方为狄夷”观点逐渐被一统天下的理想取代。到了汉代又被儒生董仲舒加以改造，成为统摄政权合法性、国家治理和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⑨ 被时人视为当时自然而然的统治结果。所以，当盐铁会议中双方就匈奴问题进行探讨时，二者都当然地将疆域治理纳入“大一统”的宏伟蓝图中，收复匈奴也就成了汉朝“治天下”议题的应有之义。

（二）仁义之辩

“仁义之辩”处理的是“如何治理匈奴”，即“治理匈奴的正确做法”问题。双方在治理匈奴上都选择了同样的儒家标准——仁义。他们从理论上对各自匈奴政策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大夫认为讨伐匈奴是符合仁义的，而贤良则认为以德待之才是仁义之举。二者针对古时行仁义之举的具体表现发表意见，其理论分歧在于对何为“仁”的界定和理解不同。

上文指出，御史大夫对匈奴的认定是负面的，该国贪婪狡猾，屡犯边境，亲近他们就如同亲近强盗。⑩ 所以匈奴的行径就是不仁义的，他们的行为危害极大：

---

①③（汉）桓宽撰，陈桐生译注：《盐铁论》卷七《备胡第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85页，第384页。

②（汉）桓宽撰，陈桐生译注：《盐铁论》卷八《世务第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50页。

④（汉）桓宽撰，陈桐生译注：《盐铁论》卷二《忧边第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24页。

⑤刘尚慈译注：《春秋公羊传译注》，成公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17页。

⑥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王制第五，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17页。

⑦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子路篇第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38页。

⑧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滕文公章句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33页。

⑨（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3页。

⑩（汉）桓宽撰，陈桐生译注：《盐铁论》卷八《世务第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50页。

大夫曰:“古者,明王讨暴卫弱,定倾扶危。卫弱扶危,则小国之君悦;讨暴定倾,则无罪之人附。”①

大夫曰:“鄙语曰:‘贤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乡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为寇,侵扰边境,是仁义犯而藜藿采。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贼也。是以县官厉武以讨不义,设机械以备不仁。”②

大夫认为,贤人不能被羞辱,而如今有圣名的天子在位,匈奴贼寇还多次侵扰边境,行不仁义之举,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今日汉朝就如同当年被侵害驱逐、拘留羞辱的太王、孔子一般,如果不讨伐不仁之人,仁义之人就会受害。所以,为了实现仁义,就必须设置军械做好防备,发展武力讨伐匈奴。由此可见,大夫认为,对不仁者仁义就是对仁者的不仁义,其“仁义”是惩恶扬善之意。

而贤良则对仁义有不同的见解,他们指出了仁义的目的和具体做法:

“古者,君子立仁修义,以绥其民,故迩者习善,远者顺之。是以孔子仕于鲁,前仕三月及齐平,后仕三月及郑平,务以德安近而绥远。当此之时,鲁无敌国之难,邻境之患。强臣变节而忠顺,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国畏义而合好,齐人来归郓、欢、龟阴之田。为政而以德,非独辟害折冲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罢罢,中外不宁者,咎在匈奴。”③

修习仁义的目的在于使百姓过上安宁生活,为政的仁义之道在于用道德感化和吸引国内外的民众,如此行事才能吸引远处的人通过良善的风气归顺。治国也是如此,孔子任大司寇时正是采取这样的方式实现了鲁国安定顺遂。仁义不是用来躲避祸患、挫败对手,而是用来规训自身的,以仁义对人便被能被人仁义对待。所以,贤良的仁义重在自身而非对方,重在自身做好道德示范、仁义待人,而非首先去评价对方的行为是否为“仁”。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惩恶扬善和仁德律己都符合孔子的思想。在《论语·为政》中记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④ 孔子认为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以德治国则众人归附。并且在惩恶扬善问题上,孔子也给出过明确的处理方式。季康子向孔子询问治国之策时,提到要不要杀掉邪恶之人以迎合良善道义,孔子答道:“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⑤ 再次体现了君主治国当做好道德典范,如此便无需杀戮。贤良的观点完全契合了孔子的治国之道,惩恶扬善似乎不是孔子所推崇的治国之道。关于孔子对待战争的态度在《论语》中亦有记载。卫灵公曾向孔子询问排兵布阵之法一事,孔子的回答反映了他对战争和礼仪的偏好:“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⑥ 孔子自谦不懂军旅之事说明了他不赞同战争方式作为治国的主要手段,而且说完之后“明日遂行”,言行皆表达了不愿辅佐好战之君的坚决态度。至此,孔子厌战的态度似乎已然明朗。再回到本文的主题,若如御史大夫所言,匈奴公然为寇、屡扰边境,导致边境民不聊生,那还要待其以仁德和平之姿吗?孔子恐怕没有极端到完全禁止战争的程度。《史记》中记载了孔子领导鲁国战胜前来袭击的费城人,文中特别描述了侵略者败北后孔子命人乘胜追击的局面,“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⑦ 由此可见,孔子并非迂腐之人,任由他国侵犯还能待之以德,由此可见,大夫所述的正当防卫也并未逾越儒家仁义的范畴。

(三)利弊之辩

双方从儒家仁义之学出发,分别论证了不同“仁义”内涵下的对匈政策,从儒家倡导的基本关系秩序层面阐发了武力讨伐或仁德引导的正当性依据。在论证了理论层面的正当性之后,双方回到了现实层面对匈奴政策可能给汉朝带来的利弊进行考量。结合昭帝时期的国内外形势,对当前讨伐匈奴进行“成本—收益”

①②③(汉)桓宽撰,陈桐生译注:《盐铁论》卷七《备胡第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89页,第381页,第386页。

④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为政篇第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页。

⑤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颜渊篇第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7页。

⑥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卫灵公篇第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59页。

⑦(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16-1917页。

的分析，分别论证了“武折”和“德怀”[①] 政策的实效。因此，“利弊之辩”处理的是政策可行性问题。

大夫认为，以武力征服匈奴是现实形势所迫，且对汉室发展利大于弊。首先必须看到匈奴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他们“据河、山之险，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强，行入为寇”[②] 侵扰我国边境，致使边境百姓常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深受匈奴侵扰、流离失所，而贤良和文学不能体察其间悲苦，是因为距离受害地区较远，“远者不离其苦，独边境蒙其败。”[③] 一旦边境地区不保，那么也将波及内地，危及社稷。其次，攻打匈奴对获取领土对国家有益，桑弘羊认为获得边境土地有利于御寇固国，成就霸业。再次，攻下匈奴也有益于累积财富和增加税收，获取“珍怪异物，充于后宫”，[④] 这些于促进国家更好发展、提升百姓生活水平而言都是实实在在的好处。武力征服匈奴，既必要，又有利。

文学认为，以武力征服匈奴对汉室发展弊大于利，德治可以很好地解决匈奴问题。御史大夫一方只看到了匈奴扰边，没有看到国家内部的矛盾更加尖锐，多年征战导致内地和边境的臣民都备受煎熬。第一，朝廷兴盐铁以资军用，沉重的赋税取之于民，导致民众经济负担加重，“百姓劳苦于内”[⑤]；第二，战争直接导致“军旅相望，甲士糜弊”[⑥]，黎民百姓“久去父母妻子”[⑦]，导致民众精神疲惫，令人悲悯。御史大夫所言的“利”远远不抵百姓所受的苦难。由此可见“武折”不行，“德怀”才是行之有效的治国策略。古时大国与小国的相处之道及其结果可以证明以德治国的真理：

文学曰：“汤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灭之。故以大御小者王，以强凌弱者亡。圣人不困其众以兼国，良御不困其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圣人之治不倍德。……夫两主好合，内外交通，天下安宁，世世无患，士民何事？”[⑧]

大国待小国以德最终使其臣服，而以强凌弱则导致灭国，这说明了谦和不背离仁德的重要性。文学的此观点也来自孟子，当年齐宣王问孟子与邻国的交往之道，孟子答道：“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⑨] 以孟子言论加上汤、周的实例使得文学的反击很有说服力，可以证明大小国家关系的好坏取决于大国的气度。如果强大的汉王朝能和匈奴友好交流、互通有无，那么两国都能相安无事，天下安宁，前述的所有国内矛盾都能迎刃而解，这才是带给汉王朝的最大益处。

至此，双方针对现实国情提出的匈奴政策已然明晰。单独看来，似乎各方都不无道理，都真实地反映了国家治理中的主要矛盾。但在争辩之中，御史大夫的一个观点非常值得考究：“中国与边境，犹支体与腹心也。夫肌肤寒于外，腹心疾于内，内外之相劳，非相为赐也！唇亡则齿寒，支体伤而心憯怛。故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⑩]中国边境与内地唇亡齿寒，福祸相依，都是治国理政需要考量的重要内容，然而御史大夫一方却并没有言行一致，其政策显然更倾向于边境的利益。他们在大力推崇“兴利之事”以资边境战事时，似乎忽视了底层百姓所遭受官僚压迫、经济压力甚至盗贼侵扰。东汉蔡邕曾就武帝时期常年征战导致国库空竭、“官民俱匮”“民不堪命，乃盗贼群起”[⑪] 的状况进行过描述。就连武帝晚年也意识到常年征战匈奴给国家带来的负担，于征和四年（前 89 年）颁“轮台罪己诏”[⑫] 转变“武折”政策。种种记录表明，御史大夫等人的治国策略并不能保证边境和内地同享福利，甚至导致两方都在受苦，且不乏认识到其不足者。再看贤良文学的观点，用仁义道德去感化一个在 35 年间至少进攻 17 次的虎狼之国，这对于当时连和亲都难以达成的汉匈关系而言，未免过于理想化。所以，从实践层面看，就匈奴政策所需投入的成本

---

①⑧（汉）桓宽撰，陈桐生译注：《盐铁论》卷八《结合第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418 页，第 421 页。

②（汉）桓宽撰，陈桐生译注：《盐铁论》卷八《西域第四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440 页。

③⑩（汉）桓宽撰，陈桐生译注：《盐铁论》卷八《诛秦第四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430 页，第 430 页。

④（汉）桓宽撰，陈桐生译注：《盐铁论》卷三《未通第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147 页。

⑤（汉）桓宽撰，陈桐生译注：《盐铁论》卷一《本议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8 页。

⑥（汉）桓宽撰，陈桐生译注：《盐铁论》卷二《刺复第十》，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108 页。

⑦（汉）桓宽撰，陈桐生译注：《盐铁论》卷七《备胡第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389 页。

⑨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梁惠王章句下，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第 32 页。

⑪（东汉）蔡邕撰：《蔡中郎集册三》卷七《难夏育上言鲜卑仍犯诸郡》，北京：中华书局，1936 年，第 5-6 页。

⑫（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913-3914 页。

及其最终反馈的收益而言，单纯的“武折”或是“德怀”都不能较好地实现“治天下”在国家治理中的既定目标，也无法协调“治天下”与“治利”和“治人”的关系。

三、“治天下”论辩的文明观延续

御史大夫和贤良、文学在针对匈奴问题上虽然呈现截然相反的治理思路，但双方都有意识地从先秦儒家中寻找依据。这是武帝时期独尊儒术思想延续的必然结果，尽管桑弘羊等人在论辩中多次诋毁孔孟，但其思维惯性还是印证了儒学在当时深入人心的地位。因此，就“治天下”这个议题而言，双方并不像许多学者概括的那样“盐铁论的实质是儒法之争”。针锋相对的论辩过程既表现了儒学思想内容丰富，又说明其可适应性强，在制度化的过程中能够被改造成多样的治理模式。其呈现的文明观在历朝历代得到了延续，但同时存在正反两个向度。

（一）家国情怀和民族凝聚力

双方就“治天下”问题展开的论辩是忧国忧民情怀的体现，言语之间流露出政治抱负和立场期待。尽管存在政治斗争的意图，[①] 但他们绝非单纯地“为自己发声”，也更是站在自身所处立场上为民请命。盐铁会议不是纯粹的文化思想论辩，而是饱含政治意图的治国策略论辩。御史大夫心系边地百姓安危，满腔斗志意欲铲除劲敌，怀揣统一天下的强国梦；贤良、文学对君舟民水的原理深信不疑，警惕商鞅式的强力压迫而导致民众不堪重负、起而反之。在阐释自己的理由观点时，双方都既看到了汉朝与匈奴两国之间的利弊关系，又关注到了民众“小家”与国之“大家”之间的连结关系，承认家国休戚与共是实施国家治理的必然前提。除了政治意图，论辩也体现出双方因身份地位不同而导致的经验认同差异。彼此社会身份不同，从他们的视角出发所珍视的价值也不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御史大夫、丞相史等人是“官尊者”，而贤良、文学等人是民间学者，双方关注的利益不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方式也不同。桑弘羊等人站在朝廷的立场，看到匈奴屡犯边境给汉朝名声威望造成羞辱和损害，给下辖的边境百姓带来侵扰和迫害，如果全国上下齐心协力贡献财利一举铲除匈奴，那么收获的国家疆土、财产利益以及百姓安宁将是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文学等人“皆出山东”[②]，多年不曾承受战乱侵扰，但常为征兵别离所苦；又亲历民间疾苦，深知朝廷大肆征战会加重普通民众生存的艰辛，尽管对匈奴不屑却也不愿牺牲百姓利益实施战役，以仁德导之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民众受苦，反战情绪事出有因，所以，与其责备贤良等人迂腐固守道德治外政策，毋宁看到他们为百姓争取生存空间的用心良苦。

在此论辩中，华夷之辨和“仁”的行事准则都为国家的军事防备和域外治理提供了理论正当性。战争的目的是高级文明形态的普及，在此处就是指发扬和传播仁德、利义等儒家先进思想，而非掠夺资源和破坏生存空间。在论辩中，双方念兹在兹的“大一统”理论就出自《春秋公羊传》：“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③] 而关于“大一统”的要件，何休注曰：“夫王者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王月，故云政教之始。”[④] 由此可见，“大一统”作为一种治理状态和理想目标，需要为君者承继天命、对天下施行政教，因此以仁德为核心的道德教化构成了行为的主要内

---

①御史大夫和贤良、文学能不受约束地在君主面前谈古论今，展开唇枪舌战，除了君主的默许外，与其背后的政治掌权者所赋予的底气有着很大的关系。武帝重病时太子年幼，便令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田千秋掌权，辅佐少主。随后武帝崩逝，年幼的汉昭帝即位，政治局势有了很大改变。金日磾为匈奴人，自认“臣外国人，不如光”，无心政事；田千秋为人谨慎有德不慕风头，每遇政事也多推给霍光，“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而桑弘羊与霍光争权，“欲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盐铁会议的召开就是霍光召集的，其欲借儒生之口将桑弘羊所行之事的弊端予以揭露，既赢得舆论的支持，又打压了桑弘羊的势头，是政治斗争的表现和延续。（汉）班固：《汉书》卷六十八《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卷六十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32、2935、2886页。

②（汉）桓宽撰，陈桐生译注：《盐铁论》卷五《国疾第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81页。

③梅桐生译注：《春秋公羊传全译》，隐公二年，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④（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第一《隐公元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页。

容。结合华、夷有别的观念可知，大汉帝国的君臣子民都坚信，以礼义德教治国的汉朝具有比茹毛饮血的匈奴更高的文明层次，无论是战争兼并还是施惠于弱者，都体现了文明优越感，这与双方的儒学背景、政治意图和社会身份立场都紧密相关，当然具有彰显家国情怀和提升民族凝聚力的正向作用，这也是汉代政治家们在复杂国内外形势面前做的坚定选择和艰难探索。

（二）自负心态和弱权利意识

在看到儒家文化赋予的文明自信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对形成现代化的“治天下”观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代依法治国思想统筹国内和国际治理两个层面，“治天下”要求国内和国际联动治理，一以贯之的文明观是实现治理效能的保障。然而偏执的文明观有助长自负心理之嫌，因而阻碍法制陷阱的识别和国家正当权利的维护，法治建设中的权利意识不够敏感，在新时期也不利于权利体系的建构。

以华夷观和仁德思想为主导的“治天下”理念影响深远，直至被现代化浪潮卷入法制社会时，我国仍呈现出割裂和不适应。西方国家率先通过工业革命进入现代化，并通过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建立起一套邦交原则和规范，该规范在清末通过译注《万国公法》的方式传入我国，对我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产生极大影响，也对长此以来的“天下观”产生了巨大冲击。该规范的初衷是促进各主权国家之间平等相处，摒弃压迫和歧视。然而西方传教士将该观念引入中国的意图却并不单纯。他们要求清政府能够遵守西方国家创设并施行的普遍规则，不要侵害他们在华权益，同时，也有基于侵略意图，利用自己制定的规则侵犯中国国家主权的目的。但到了深受华夷观念、朝贡制度“滋养”的清朝官员那里，该行为就变成了对中华“畏威而怀德”，于是“我中华一视同仁”。① 在西方国家提出让中国给予他们“领事裁判权”时，清朝大臣在奏章中说道：“臣等查通商之务，贵于息争。如有英人华民涉讼，英商应先赴管事官处投禀。即着管事官查明是非，勉力劝息……免致小事酿成大案。”② 秉持止讼态度，表达了对赋予他国审判该国公民行为的许可，未能察觉其间蕴含的对我国司法管辖权的侵犯，极易纵容他国臣民在我国的犯罪行为。关于“最惠国待遇”的应对也是尽显“施舍”之风：“一英夷已足害边疆，况合众夷而使之为一耶！此又不可不审思熟虑者也……今该夷（米利坚）既肯通融，各夷亦皆乐从。法穷则变。与其谨守旧章，致多棘手，莫若因势利导，一视同仁。”③ 涉事官员以“宽容”之姿将涉及国家自主审判权和优惠待遇分配这些重要的权利拱手让人，未能识别西方列强制造规则陷阱行侵害我国主权之实的狼子野心，只顾着传承“华夷之辨”的高昂姿态了，却没有了千年前盐铁会议上御史大夫等人对北境匈奴狼子野心的洞察和提防，最终任由列强侵犯国家主权。

儒家哲学是一个“人”的哲学，“天地之性人为贵”，④ 它强调人有别于禽兽的根本差异，承认并善于运用人的自然欲求，即便是汉儒对儒学的改造常被质疑其用意，也不能否认的是董仲舒在设计以儒学为根基的治国策略时主张“人受命于天，贵于物也。”⑤ 强调了人不可与物相比拟，人比物要珍贵。“华夷之辨”中蕴含了“文明有高低之别”“人因血缘或地域不同而有异”的基础理论，这种否定、排除特定种族文明乃至人种的观念忽视了人的独特性价值，虽然源自儒家却又与儒家向来重视人的价值导向截然相反。而此种文明观虽根自古代中国，其影响和表现却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法制实践中。在当代国际治理语境中，依约依法治理国家和国际事务的基本观念已是共识，早已摒弃了渊源于血缘和地域联系的“华夷之辨”，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⑥ 的转变。国家交往的规制形式变化反映了文明观的变迁，人权观念和意识是现代法治区别于传统法制的根本所在，“弱肉强食”式的文明观指导下的治理手段显然背逆国际交往基本准则。在法治实践中，由种族歧视理论“指导”设立的规范存在权利分配不均、程序适用不一的问题；为排除所谓“劣等基因”而实施屠杀和迫害等违法犯罪行为；运用生物学、医学等先进科学实施的基因筛选、重造等行为严重违

---

①[美]惠顿著：《万国公法》，丁韪良译，何勤华点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6、9页。

②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十七《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公元一八四三年）》，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690-2691页。

③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十四《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公元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三年）》，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537-2538页。

④（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16页。

⑤（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16页。

⑥[英]梅因著：《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10页。

反了自由平等的法治精神……这些都给人类生命安全和民族国家交往造成了惨痛伤害。“治天下”的操作动作不应当是抵触和排除，而应当是协调和开放。以某种文明为最优的预设只能导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历史的经验无数次证明，这二者带来的灾难将是世界性的、全人类的。权利意识的前提是互相尊重，尊重权利来源的多样性，尊重权利之间的平等性，这是值得所有国家在“治天下”时应当警惕的。

结　语

盐铁会议的召开并不是简单的思想碰撞，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该论辩包含了复杂的经济、政治、思想动因，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意图；也内含了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失败者必然要付出惨痛代价。会议召开后，贤良、文学的提议被部分支持，汉昭帝下令取缔了全国范围内的酒榷官营，并撤销了关内的铁官，这是缓解当时国家矛盾的重要举措。而对于主张盐铁和酒榷官营的桑弘羊而言，不但在论辩中多次失势，又在会议结束后的次年因卷入燕王刘旦谋反案而被杀，历史事实背后的儒家思想动因及其发展势头、政治斗争及其策略布局不免成为分析人物命运的重要线索，也构成对论辩本质的真实揭露。儒家思想作为双方重要的思想动因在“治天下”论辩中被融合，又被分裂，这都是武帝时期“独尊儒术”思想政策的必然影响。华夷相区别和实施仁德之治的观念在盐铁会议中被各方多次引用、转述，直至潜移默化为诸多政治行事准则。值得庆幸的是，双方在针砭时弊，对时下国情做利弊剖析时，儒家思想内含的理想主义在制度化过程中也没被消磨掉，反而化为了汉人强烈的民族自信。这对当前面临复杂国际形势考验的我们来说是很难得的精神财富和思想资源。但思想的延伸和变形是具有两面性的，各国均是如此。在传统“治天下”理论中形成的文明观存在阻碍当代法治发展的部分，是所有国家都需要警惕和剔除的。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盐铁论》所记载的汉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就汉匈关系所做的艰难探索。因此，了解到思想在法治建设中的不同面向及其调整方向，也许比简单评价双方的观点对错本身更有意义。

The Debate on “Governing the World” in *Yan Tie Lun* and Its Historical Value for Reference

WEI Kai-wen

(International Confucian Academy,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The *Yan Tie Lun* records the dissenting views of the imperial censor Sang Hongyang and Xianliang, Wenxue figures in “governing the world”. The two sides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identity of the Xiongnu, and their response strategies are also different. The Imperial Censorate believed that the country of Xiongnu bandits, which repeatedly invaded the border, should send troops to suppress it; However, Xianliang and Wenxue sides believe that the small Xiongnu country is not worth mentioning and should be guided by benevolence and virtue to submit to the Han Dynasty. In terms of specific reasons, both sides debated whether to govern and the legitimacy of govern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They are respectively th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Hua and Yi, the debate between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and the debate betwee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Confucian ideology that permeates the debate process either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guides the direction of the debate, resulting in a debate that is not entirely at odds with opinions. This theory of “governing the world” originating from Confucianism reflects the political intentions and identity consciousness of both sides, providing a relatively stable civilized view for governing inter state relations. However,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of rule of law, while the civilization concept of “governing the world” provides confidence in civilization, it also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w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Yan Tie Lun*;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world; Xiongnu

[责任编辑　山阳]